

# 明代湖北儒学研究

编者按：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选题，应尽量避免重复、撞车，宜打开视野，潜心发掘新的材料，探索历史上各断代、各地域一些尚未深入研究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我国哲学史上还有很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学者宜下功夫去开垦。因此，我们不主张在主要人物上扎堆。有鉴于此，我们就明代（含明末清初）湖北的儒学思想家的研究，组织了一组文章。明代湖北儒学颇为复杂，王阳明及其后学、陈白沙与湛甘泉学俱兴，会通三教成为趋势，这在李承箕两兄弟、李贽、耿定向三兄弟和公安三袁身上都有体现。明后期陈士元、郝敬、瞿九思、胡承诺等重视经学诠释，主张“回到孔孟”，强调修身实践。开放性、对话性与务实性，是其时代与地域的特性。以上人物，我们今人已相当陌生，但在明清两代，这些人物在湖北乃至全国，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组织、发表这五篇文章，旨在倡导哲学史研究课题、方法、内容的多元与深化。

## 李贽、耿氏兄弟和公安三袁

许苏民 许广民

“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峯嵌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sup>①</sup>这是王夫之纵论荆楚地理的一段名言。江山如此，人的真性情亦如江山之气一样莫能掩抑，故此地人多大气、直率、刚烈。其影响学风与文风，不可谓不深且巨。

又据范锴《汉口丛谈》记载，万历年间，汉口成为与北京、苏州、佛山齐名的商业都会（“天下四聚”）之一。荆州、沙市亦已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这种新兴气象的出现，既使湖北成为最适合新思想生长的地方，也使它成为新旧思想激烈论争的场所。荆楚地区交通之便捷，更促成了新思想在全国的迅速传播。

明代中叶以后湖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不仅培育了以此为第二故乡的大思想家李贽，也造就了本地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贽与耿定向的争论，是晚明思想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

重要事件。而公安三袁更以开风气之先“必自楚人始”的历史自觉和理论上超迈前人的杰出成就，使湖北成为晚明最具启蒙意义的性灵文学的策源地。

—

李贽（1527—1602），号卓吾，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出身于“航海世家”家庭，是晚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旗帜。他去世后，其崇拜者赋予了他犹如开天辟地的盘古式的文化象征意义。在世界上，他被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先行者利玛窦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sup>②</sup>。

李贽结识湖北学者，是在隆庆六年（1572）任南京刑部主事时。这年，担任南京督学的耿定向在清凉山上建崇正书院，其弟耿定理亦来到南京。李贽与定理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定理问：“学贵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

故又曰‘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试看自信与自是，有何分别？”李贽回答说：“自以为是，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不自以为是，亦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定理听了大笑。按照李贽的说法，这笑声“盖深喜余之终可入道也”<sup>③</sup>。这时的李贽，还是一位刚刚接触泰州学派思想的寻师问道者。

万历五年（1577），李贽被任命为云南姚安知府。从南京溯江西上，到湖北团风舍舟登岸，将女儿、女婿托付给耿氏兄弟，并与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俸禄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也。”所谓“同登斯岸”，即与耿定理一起寻求人生真谛。李贽不负所约，于万历八年（1580）辞去知府职务，万历九年（1581）正月末来到黄安，与耿定理相聚。他在耿家住了四年后移居麻城，又于万历十五年（1587）秋让女婿庄纯夫把住在黄安的家眷送回福建老家，并于万历十六年（1588）夏在麻城削发，移居龙潭寺。从万历九年到二十八年，除了几次短暂的外出旅行外，他以湖北为家，度过了大约二十年的时光。

一个外乡人，弃官弃家弃发，无权无势无钱，又是思想异端，却能以湖北为家二十年，这在官僚本位、家族本位、崇拜富贵、排外心理盛行的传统社会里，可算是一个奇迹。晚年李贽曾在南京小住，虽有焦竑这位状元朋友，但陶望龄还是给焦竑写信说：“世上眼珠小，不能容人。况南京尤声利之场……文须善为之计……无令山神野鬼，得知踪迹。”<sup>④</sup>可见当时连江苏的人文环境亦不如湖北。“楚人元以凤为歌”<sup>⑤</sup>，湖北能够接纳、供养李贽二十年，足见此地民风、士风之不同一般。李贽“以友朋为性命”，在湖北结识了很多朋友。除了耿氏兄弟外，主要有周思久、周思敬兄弟，梅国桢、梅国楼兄弟及其子女，“公安三袁”，以及弟子杨定见、汪可受等。

周思久字子征，号柳塘，麻城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进士，与海瑞是好朋友。隆庆四年（1570）从琼州知府任上退休，在麻城建辅仁书院，讲学授徒。数年后购得龙潭湖这片胜地，创建芝佛寺。周思敬（1532—1597）字子礼，号友山，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初为张居正所赏识，后因救援台官而忤其意，被贬四川。张居正去世后，吏科给事中邹元标上疏，说周思敬不阿附张居正，因而被升为太仆寺少卿。周思敬却上疏说“相臣（指张居正）实臣知己”，这一高风亮节使李贽十分敬佩，说：

“若夫剖心析肝相信，意者其为古亭周子礼乎！”<sup>⑥</sup>李贽到黄安后，周思久常到黄安小住，与李贽和耿氏兄弟等人切磋学问，亦常邀李贽去麻城讲学。周思敬亦以李贽为师，白云“心切师事之”。李贽于万历十三年（1585）三月离开耿家而移居麻城后，主要是周氏兄弟供养了他，他居住的芝佛院，就是周氏兄弟为他修建的。

万历十六年（1588），李贽在麻城结识梅国桢。梅国桢（1542—1605）字客生，亦作克生，号衡湘。年轻时就勇武过人，善于骑射，又能写一手很好的诗文，是一位能文能武、具有非凡见识的豪杰之士。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曾协助李成梁赴宁夏作战、平定哱拜之乱，李贽作《西征奏议后语》，盛赞其才智和为了国家安危不顾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梅国桢对李贽也很推崇，说：“余在行间无与语者；思可共事无如秃翁。”<sup>⑦</sup>他在为李贽《藏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自古豪杰之士，其识趣议论，与世人定不相入……余友李秃翁先生，豪杰之士也。”<sup>⑧</sup>可见二人相知之深。梅国桢的女儿梅澹然结识李贽后，经常写信向他请教佛学。李贽曾作《题绣佛精舍》诗，用月上女与舍利佛的典故，把澹然比作月上女，以天女呈男相而不转女相，比拟澹然为女中丈夫<sup>⑨</sup>。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就写了一篇传诵至今的《答以女子学道为短见书》，盛赞“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的女子。

据袁中道《柞林纪谭》记载，万历十八年（1590）春，李贽漫游到了公安县，住在村落野庙中，且以“狂禅”的样子出现在集市上。当地人不知他的来历，便称他为“柞林叟”。熟知历代狂士怪诞人格的年轻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猜想这人有些来历，便去荒村野庙中寻访他。三人一见到李贽，便向他提出许多问题，李贽一一作答。三袁叹之为“大奇人”。同年秋，李贽以新近刊刻出版的《焚书》寄赠三袁。宏道作诗，喻之为空谷足音（“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sup>⑩</sup>），备致倾倒之意。万历二十一年（1593）初夏，三袁兄弟又与友人王以明、龚散木一行五人自荆州乘舟东下，与李贽共度端午佳节。据《麻城县志·袁中郎传》记载，这次龙潭之会，李贽对三袁的评论是：宗道稳实，宏道、中道英特，都不愧为天下名士；但若论识力胆力，宏道乃迥绝于世，是真英灵男子汉，“于入微一路”即从哲理高度把握李贽学说精髓而张大其帜者，则非宏道莫属。万历二十

八年(1600)秋,宗道逝世,李贽作《哭袁大春坊诗》,表达了恨不得与宗道同去的深挚感情。李贽去世后,中道作《李温陵传》,讴歌李贽的优秀品质。

李贽在湖北还有几位学生,比较有名的是黄梅人汪可受、麻城人杨定见。李贽在武昌避难期间,杨定见“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至”。李贽在武昌赋《登楼篇》诗,评论麻城人物,称“中有杨定见,三载独区区,心事如直绳,孤立终不惧”<sup>⑩</sup>。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李贽又在《八物》一文中盛赞杨定见,说他“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然后知其终不肯叛我以去”<sup>⑪</sup>。荆楚豪杰,其仗义如此。

在少数人要迫害李贽时,就连湖广巡抚、布政使也保护过他。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发生后,不得不一度离开黄安,避难于武昌。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主动前往洪山寺拜访他,此后“或迎养别院,或偃息官邸,朝夕谈吐,始恨相识之晚”<sup>⑫</sup>。连巡抚李克庵在读了他的书以后,也以他为真人<sup>⑬</sup>。这也是李贽这位著名的思想异端能在湖北长期生活和写作的重要原因。

在湖北生活的二十年,是李贽之所以成为李贽的二十年。李贽一生的主要著作《初潭集》、《四书评》、《焚书》、《藏书》等,都是在湖北写成的。

宋明哲学有三个里程碑,分别以“天理”、“良知”、“童心”为最高范畴,而以“童心”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正是李贽的创造。从“童心说”出发,他展开关于人的自由的本体论论证,同时借助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语言学释义,直探历史文化世界之本原,论证了“人即道,道即人”、“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的人学本体论思想。他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具体的个人,主张“普天之下更无一人不是本”,与以抽象类精神来淹没个体的先验本体论划清了界限。在认识论上,“童心说”具有把一切先入之见悬置起来、以获得一种认识世界的原初视野的意义;他认为“执一便是害道”,提出了反对道统论的“道非一途,性非一种”、“道无绝续,人具只眼”说;以“学主不欺,志在救时”<sup>⑭</sup>为宗旨,主张“道不虚谈,学务实效”,鲜明地提出了“治贵适时,学必经世”的主张,提倡“实学实行实说”,主张以社会功利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深刻论证了“为道屡迁,变易匪常”的辩证发展观,确认“与世推移,其道必尔”,这正是后来王夫之讲道应时而变先声。

他在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史学史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的命题,阐述了“经与史相为表里”的历史学方法论,主张史学研究应重在揭示兴亡治乱的规律,以更好地发挥其“昭彰事实,垂鉴后世”的功能,为“志在救时”的实践目的服务。他把“童心说”推广和运用于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著名的“论赞须具旷古只眼”说和“原情论势”而“断自本心”的方法论原则。在文艺思想方面,他提出了“自然之谓美”的命题,深刻揭示了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他认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反对文学上的复古主义;他提出了“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的深刻命题和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怒骂成诗”说。在政治思想方面,他认识到专制制度的本质是“诱人作他奴才”,专制统治者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了“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的制度性腐败;他主张“因乎人”、“恒顺乎民”的“至人之治”,并提出了一些志在救时的改革主张。后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提出的改革主张,几乎都是他曾经提出过的。

不过,最使道学家们反感的还是他的道德伦理思想。他以毫无伪饰的“童心”,直面现实的人性,揭示了“人必有私”的客观事实,提出了“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虽盗跖不能无仁义之心”的命题。他认为“大道不分男女”,对“女子小人论”、“女人祸水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展开了全面批判。他还批判了传统的“男怨风流,女戒淫邪”的双重两性道德,通过对“失身”与“获身”之辨的阐说,来讴歌婚恋自由、肯定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他反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操观和节烈观,主张“不以必死劝人”,肯定寡妇再嫁、为爱情而私奔的合理性;他提出了“各从所好,各聘所长”的个性解放学说……。最后置他于死地的罪状之一,就是“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

李贽最后被迫离开湖北,其实是个别小人作祟。万历二十八年(1598),通政使杨时乔上疏,要求禁罗近溪之学。麻城有一个勾引梅澹然未成、从而怀恨在心的举人黄建衷,乘机造出了李贽与澹然“僧尼宣淫”的谣言。据沈德符记载,“梅衡湘长女嫠居,有才色,结庵事佛。……黄(建衷)心欲挑之,苦无计。其妾亦姝丽能文,乃使诡称弟子,学禅于澹然。……因乘间以邪说进,且述其夫殷勤意。澹然佯诺,谋于司马(梅

国桢)……因令入司马家晤语。……其妾甫进门,则女奴数辈竟拥香车入司马曲房,自是扃闭不复出,而澹然亦不复在过其旧庵矣。”<sup>⑩</sup>这位举人老爷偷香窃玉不成,反倒连妾也赔进去了,怎能不恼羞成怒!在他的煽动下,不明真相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作出了“毁龙湖寺,真从游者法”的决定。李贽只得在杨定见护送下离开麻城,前往河南,从此便永远离开了湖北。他死后,麻城的友人们以“西陵同志”(西陵乃麻城古称)的名义作《拜仵功德疏》来纪念他。

## 二

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是晚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件。争论意味着泰州学派内部的剧烈分化。

耿定向(1524—1597),字在伦,学者称天台先生,与弟定理、定力合称黄安三耿。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万历间曾任福建巡抚,官至户部尚书,著有《天台文集》等著作。其弟定理(1534—1584)以诸生终,定力为隆庆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曾疏陈矿使之患。黄宗羲《明儒学案》列《恭简耿天台先生定向》、《处士耿楚侗先生定理》,足见此二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黄安三耿中,定向和定理都是何心隐的学生,李贽则是王襞、王畿、罗汝芳的私淑弟子,论师承关系,都属于泰州学派。论私交,李贽与耿定向的关系也很不错。李贽的女儿、女婿住在耿家,定向对待他们“亦如己女己婿一般”(李贽语),李贽对此也很感激。但这个学派内部极为复杂,思想主张其实并不一致。耿氏兄弟论学不合,李贽更倾向定理。但李贽与耿定向论学更不合,周思久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之说。争论把矛盾挑明了,并通过争论而促进了思想的发展。

争论是从万历十二年(1584)开始的。这年七月耿定理去世后,耿定向再也容不得李贽,说他教坏了耿家子弟,使得李贽决意离开他家。而此时李贽又结识了何心隐的高足胡时中,听说耿定向在何心隐遭迫害时见死不救,不啻火上浇油,由此引发了他们在为人学与为学问题上的激烈争论。

首先,师友之道与官场之道孰尊?

李贽先后写了《何心隐论》、《答邓明府》、《与焦漪园太史》等文,表彰何心隐而批评耿定

向。他盛赞武昌上下数万人无不说湖广巡抚衙门贴出的何心隐罪状榜文是造谣诬蔑,甚至有愤怒至极、呼喊叱咤以示抗议者,而讲道学的耿定向却不肯救自己的老师,是何道理?他感叹说:“时无张子房,谁为活项伯?时无鲁朱家,谁为脱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之假也。……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划出其类,又可知也。”<sup>⑪</sup>

在《答耿司寇》一文中,李贽批评耿定向工于利害算计,不讲友朋道义。他说:“嗟夫!朋友道绝久矣。余尝谬谓千古有君臣,无朋友,岂过论欤?”他说皇帝像龙一样,龙的下颌有逆鳞,犯者必死,但还是不断有人敢犯颜直谏,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为此而死,也可以博一个“忠臣”之名;何况犯颜直谏不一定会死,有时还会带来巨福呢。因此,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况其无害而有大利乎?但朋友之间就不同了,如果谈得来,未必有好处;如果谈不来,就会引起争论,甚至成为仇敌。何心隐就是因为与那帮道学朋友们谈不来而遭杀身之祸的,死了还要被称为“大盗”,就是显例。李贽又说:“故余之谓千古无朋友者,谓无利也。是以犯颜敢谏之士,恒见于君臣之际,而绝不闻之朋友之间。”<sup>⑫</sup>这是批评耿定向不敢在张居正、李幼滋面前为何心隐讲话,而张居正和李幼滋都是耿定向的朋友。耿定向当然要为自己开脱辩解一番,说自己还是为何心隐讲了话的,于是李贽就对他说:“我知公详矣,公其勿再说谎矣!”<sup>⑬</sup>耿定向以罗汝芳、王畿、邹东廓的继承者自居,李贽就质问他,邹东廓学说的妙处全在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你能做到吗?<sup>⑭</sup>

耿定向是否真的对老师完全见死不救,时下学界尚有争议。黄宗羲《明儒学案》亦谈及此事。他说:“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隐之狱,惟先生与江陵(按:张居正)厚善,且主杀心隐之李义河(按:工部主事李幼滋),又先生之讲学友也。斯时救之固不难,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悦学之忌。先生以不容己为宗,斯其可已者邪?”他认为耿定向有能力救何心隐,却不敢救,实在是言不顾行的表现。由此看来,在师友之道方面,李贽倒是颇重传统美德的。

其次,如何看待对待纲常名教?

泰州学派传到颜山农、何心隐手里,“非名教所能羁络”,于是耿定向便标榜“不容己”之说,要把泰州学派纳入纲常名教的轨道。他认为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可以与世推移、因时变化的,

但道德却是万古不变的。这万古不变的道德乃是圣人垂示，后人只能依仿圣人，不容予以改变：“窃谓古人有与时推移因时变化的模样，有自生民以来不容改易的模样，有从闻见上来名义格式的道理，有根心不容已的道理。夫所谓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样，古人原从根心不容已的道理做出，所谓‘天则’、所谓‘心矩’是也。此非特不可不依仿，亦自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也。……古人继天之不已者以为心，虽欲自己，不容自己矣。……比来目见学术浇漓，人心陷溺，虽不敢妄拟孔孟模样，窃亦抱杞人天坠之忧矣。”<sup>②</sup> 耿定向认为，纲常名教既是“天则”，也是“心矩”；个人作为纲常名教中的一个角色，就要在其中尽伦尽职，这就叫“不容已”。他反复强调：“余所谓不容已者，即子臣弟友根心处，识取有生常道耳。”“惟是从不容已之真机，一自循省子臣弟友，便有多少不尽分处。”<sup>③</sup> 孔孟之所以高于诸子百家，就在于“以其一种不容已之仁脉有以贯通于天下万世”<sup>④</sup>。

针对耿定向的“不容已”说，李贽提出了自己的“不容已”说。他说，耿定向的“不容已”之说讲的是《弟子职》诸篇关于人在十五岁以前入孝出悌等事，而他所说的“不容已”则是人在十五岁成人以后明《大学》、“欲去明明德于天下”等事；耿定向讲的“不容已”，关注的是“痛痒之末”，而他所讲的“不容已”则要人收“开眼之功”。圣人的学问，不是乡村训蒙师的学问。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等，对小孩子讲讲还差不多，大人们则要开眼看社会。圣人不是孔家的专利，“满街皆圣人”，“人人是佛”；且社会至大，“人心至神”，每一个人都有其对善的理解和追求，连耕稼陶渔之人也不例外。因此，“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陶渔之人既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sup>⑤</sup> 既然善存在于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实践之中，至神的人心亦非孔学所能规范，所以就不能唯我独尊，不能说孔学就是人人必须遵奉的“天则”和“心矩”，不能说纲常名教就是“千古不容改易的模样”。

这些批评耿定向的文字，都被李贽收入《焚书》，并于万历十八年刊刻出版。恰好这一年耿定向回到黄安，于是便写了《求傲》一文。《求傲》名为求人针砭自己，其实是以孔子自居，说“夫子得子路，恶声不至于耳”，希望他的门生当子路这样的贤者，对李贽这样的异端“鸣鼓而攻之”。他说李贽来湖北，原是因为有耿定理；定

理去世了，没有人能长其善而救其缺。如今关于他的恶声盈耳，这是我所不忍听到的，“且令后学承风步影，毒流万世以下，谁执其咎”？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我耿定向才苦苦地规劝他，与他发生了争论。我所争的，是“为天下人争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界限耳”。他说甘食悦色是性，我也承认，但甘食悦色决不能逾越礼教的规范，如司马相如以琴声来引诱卓文君私奔，我决不敢说这是“率性无碍”的。他说暴怒是性，我也承认，孔子诛少正卯，“圣人所以尽性也”，但是像胡荻攻击朱熹那样，我也是决不敢说这是“率性无碍”的。这些事情在学理上至为微妙，但却关系到纲常名教，因而不能不辨<sup>⑥</sup>。耿定向忧时之心可悯，但坚执一元文化心态，看不到传统也有可变的方面，确有偏于保守之弊。

最后，何为“自得良知真趣”？

这一问题是在围绕李贽私生活而进行的唇枪舌战中展示出来的。私生活那点事本不足道，但在这一争论中，却包含了耿李二人对什么是“自得良知真趣”的不同理解。

与同时的士大夫相比，甚至与士大夫中的“贤者”相比，李贽的生活自律算是比较严的。他一生从未纳妾，孤身一人在外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著书立说上，寂寞时就通过看剧本、小说去赏玩“花月儿女之情状”。但也有偶尔耐不住寂寞的时候，曾与青楼女子有过交往。此事被耿定向知道后，遂写信告诉周思久。思久回信说李贽并非真的狎妓，是你未能参会其禅机罢了。耿定向遂借“禅机”二字大做文章，说李贽“强其弟狎妓，此亦禅机也”，“率众僧人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薄之羞，士绅多憾之，此亦禅机也，夫子见南子是也”。又云：“昔颜山农于讲学会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卓吾种种作用，无非打滚意也。第惜其发之无当，机锋不妙耳。”<sup>⑦</sup>

李贽首先对耿定向所说的几件事一一作了如实表白。他承认狎妓实有其事，不是什么禅机，“惟见其丑，故不得不昭昭申明于大庭广众之下。”<sup>⑧</sup> 但他并没有强迫弟弟去狎妓，而是觉得他孤身一人可怜，所以才让他与妓女来往，这也不是禅宗接引人成佛的所谓禅机。“使嫠妇冒帷薄之羞”，则纯属谣言。这位寡妇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时时给寺院送茶馈果。因为有人造她的谣，这才带着僧众去访问她：“我自报德而重念之，有冤必代雪，有屈必代伸，亦其情然者，亦何禅机之有，而以见南子事相证也？”<sup>⑨</sup> 至于

颜山农讲学就地打滚之事，“若果有之，则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进而反唇相讥道：“夫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而独山农一打滚便为笑柄也！”他说假道学们打滚，是偷偷进行；颜山农打滚，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滚，自得其真趣，“此亦山农自得处耳，与禅机总不相干也。”<sup>②</sup>李贽自述其私生活，毫不隐讳，其可贵者在于一个“真”字。但过于张扬颜山农式的就地打滚，认为其“自得良知真趣”，就未免有欠思量。耿定向说李贽只看到了颜山农的“禅那家接引初机”而“更不察其心行如何”，并非全无道理；但以此痛骂李贽“所以淫而邪也”，亦未免过分。

李贽与耿定向有许多共同的朋友。被李贽许为“第一知己”而又对李贽极为推崇的焦竑，就是耿定向的学生；周思敬既与耿氏是儿女亲家，又与李贽是好友。梅国楼和衡州丞沈铻也是耿、李二人共同的朋友。由于这些朋友从中调解，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贽会耿定向于黄安山中，相互抱头痛哭，从此不再公开争论和互相攻击。

李贽与耿定向的争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管东溟说：“好事者……以天台师与李卓吾之对立，引以为话柄，传唤四方。”<sup>③</sup>在朝廷中，一部分官员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官员则为李贽辩护。心仪李贽的，有蓟辽总督顾养谦、漕运总督刘东星、大同巡抚梅国桢、御史马经纶、侍郎周思敬等人。“己亥庚子间”（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朝中崇拜李贽而常在一起聚会的官员，有“楚中袁玉王番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与浣上吴本如，蜀黄慎轩，……浙中陶石簃（陶望龄）”等，他们“旬月必有会”，以至“高明士夫，翕然从之”。可见这场争论的影响之大。

### 三

公安三袁之袁小修作《花雪赋引》，畅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而“变之必自楚人始”，其言略云：“夫楚人者，才情未必胜于吴越，而胆胜之。……其中孕灵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独出新机者，有首为变者，出则不惮世之毁誉是非，而褻褻从之矣。”<sup>④</sup>

如前所说，李贽之所以成其为李贽、“又创特解”是在湖北，而生于斯、长于斯的公安三袁更洋溢着开风气之先“必自楚人始”的历史自觉和“不惮世之毁誉是非”的奇情豪气。三袁中，长兄伯修（宗道，1560—1600）最先开始批评“后七子”文学主张之流弊，中郎（宏道，1568—1610）进而提出“性灵说”的文学主张，小修（中道，1570—1623）则以“精光说”辅翼之，以“慧极生趣”说补益之，遂使公安派成为晚明文坛开风气之先的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

伯修作《论文》篇，提出了与晚清学者所主“言文合一”相似的文学主张。文章开篇即云：“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代街谈巷语耶？”<sup>⑤</sup>他说李攀龙不懂得这一道理，遂主张模拟古人，然而他的文章，尚且多出己意，记事述情往往逼真，可是后人却把模拟古人视为定例，见有一语不肖古人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遂使文风愈趋愈下。这种风气是违背文章贵在达意、语言亦有古今的创作规律的。他认为文章的价值取决于作者是否真有见识，“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批评李攀龙“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之说是“强赖古人无理”，王世贞所谓“六经固理藪已尽，不复措语矣”之说“则不许今人有理”，因此，复古文风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况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sup>⑥</sup>这一论述在公安派的文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

袁宏道的“性灵说”作为三袁共同的文学主张，虽得益于李贽“童心说”的启迪，但亦带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万历二十四年（1596）春，宏道在号称“人文渊藪”的江南地区举起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他在为小修诗集撰写的序言中说：“（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sup>⑦</sup>他说性灵是“任性而发”、“通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至情”，他之所以推崇小修的诗，就在于其中多“情至之语”：“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他以屈原《离骚》为例，批评了产生于北方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温柔敦厚”的诗教，认为“怨而伤”的风格乃是由荆楚自然环境所导致的特征：“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恚，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义何疑焉！”小修之诗，正体现了楚风的特征：“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他还认为，性灵是“得之自然”、“关乎神情”、“唯会心者知之”的天然真趣。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sup>⑤</sup>。趣是自然而然、发自至性的感觉的灵悟，是心与境合的神交、默契。“自然二字，趣之根荄”（陆云龙评语）；“率性而行，是谓真人”<sup>⑥</sup>。因此，趣在儿童，趣在山林之人。相反，官场中人“有身如桎，有心如棘”，乃至毛孔骨节皆被束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sup>⑦</sup>。

袁宏道还通过重新解释“絜矩之道”，提出了一种新的情理观。他说“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后儒将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以民之情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从理上絜去，必至内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乎？夫非理之为害也，不知理在情内，而欲拂情以为理，故去治弥远。”<sup>⑧</sup>他认为孔子的“絜矩之道”以民之情为“矩”，以情絜情，是为顺乎自然；后儒将“絜矩”之“矩”看作“理”，以外在于情的“理”去“絜”情，是反乎自然的，因而是“非理”之理；回到孔子的学说，就必须确认“理在情内”。这一观点对于晚明和清代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通过对复古主义文风的批判，袁宏道阐明了富有历史感的文学演化论，洋溢着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正因为秦汉人不模拟《六经》，方才有秦汉之文；盛唐人不模拟汉魏，方才有盛唐之诗。他认为文学的发展有由繁、晦、乱、艰向简、明、整、流利痛快发展的规律性，把这一观点概括为两个重要的命题，即：“古之不能为今者，势也”；“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sup>⑨</sup>从作家的创作个性立论，他认为每一个作者都有表现其独特个性的权利，不应强制推行一种风格而排斥其他的风格，提倡学者应有“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的顶天立地的气概，他说：“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

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sup>⑩</sup>

袁中道称“性灵”为人之“精光”。其《解脱集序》云：“夫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sup>⑪</sup>张大反对复古主义的思想旗帜，主张“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认为只有“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又云人之“心灵无涯，搜之愈出”，只有“相与各骋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而皆各有所长，以垂之不朽”<sup>⑫</sup>。他肯定性灵说在反对复古文风方面具有“文起八代之衰”的意义，同时也对性灵说的理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宏道说，对于趣，“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而他则提出了著名的“慧极生趣”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智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之气所致，故倍为人所珍玩。至于人，则别有一种俊爽机颖之类，同耳目而异心灵，故随其口所出，手所挥，莫不洒洒然而成趣，其可宝为何如者！”<sup>⑬</sup>这一论述，对性灵的体与用作了必要的区分，以慧为体，以趣为用，确认趣从慧出，回答了何以说性灵得之自然者深的问题，丰富了性灵说的理论内涵。他为宣传性灵说不遗余力，但也反对把公安派的创作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认为服膺性灵说者，“请胸中拈出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诗文”<sup>⑭</sup>，方为得性灵说之真谛。这一论述，对于针砭公安派末流的弊病，亦具有重要意义。

崇真尚奇，是晚明文风的重要特征，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集中体现。公安派学者认为，在“真”与“奇”二者中，“真”是前提，有真方有奇，真正的新奇是不受格套束缚的真性情的流露，是发自性灵的戛戛独造。他们张大王阳明的“狂者胸次”，以狂人、奇士自居，主张以发自真性灵的新奇风格去对抗载道文学的平庸，提倡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去冲决囚缚，充分表现自己的个性，以造就奇士、奇文。袁宏道评江盈科：“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sup>⑮</sup>雷思霈评袁宏道：“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

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sup>⑥</sup>在“大而伪”与“小而真”二者中，宁可选择“小而真”去从事小品文创作，决不去写“大而伪”的文章；在“平”与“奇”二者中，宁可选择独抒己见的“奇”；在“正”与“偏”二者中，宁可选择深刻的片面。针对卫道士们对狂者的攻击，袁宏道辩护道：“以圣斥狂者，是以横吹之声刺空谷之响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冈之旧垒，难南冈之新垒也。……以中国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士音，正闽瓯之乡语也。”<sup>⑦</sup>这段文字，视狂者之声为空谷足音，称性灵文学的新文化营垒为“南冈之新垒”，明确反对“以圣斥狂”、“以古折今”，赋予了当时这批狂者的文学流派以新的时代意义。

公安三袁的新兴气锐的文字，给予了明代中叶一度统治文坛的复古文风以有力批判，赢得了一大批少年英俊豪举之士的响应，从而起到了扭转文坛风气的巨大作用。如后来钱谦益所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始知疏濬心灵，披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sup>⑧</sup>这一论述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注释：

① 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船山全书》第14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08页。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8页。

③⑥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李贽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20、216、101、150、83-84、27、30、31、29、253-254、255、255页。

④ 陶望龄：《歌庵集》卷11，《续修四库全书》

本。

⑤⑩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8、25、187、463、193、463-464、1290、515、501-502、710、1695、799页。

⑦⑬ 《李贽文集》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47、348页。

⑧ 《李贽文集》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⑭ 沈铤：《李卓吾传》，《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页。

⑮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2，《黄宗羲全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页。

⑯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黄取吾兵部》，《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4-595页。黄建表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担任过兵部主事，故沈德符称之为“黄取吾兵部”——引者按。

⑰⑱⑲ 耿定向：《与李公书》，《耿天台先生全书》卷3“书牋上”。

⑳㉑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书》卷四“书牋下”。

㉒ 管东溟：《惕若斋集》卷2《寄耿学宪叔台年兄书》。

㉓④①②③④ 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460、452、522、456、522页。

㉔③③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285-286页。

④⑧ 钱谦益：《列朝诗集·袁稽勋宏道小传》。

作者简介：许苏民，男，1952年生，江苏如皋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许广民，女，1962年生，江苏如皋人，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城市科学系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36。

## 李 承 箕 的 心 学

孙 奕

李承箕（1452-1505），字世卿，号大厓居士，湖北嘉鱼人，著有《大厓李先生集》二十卷。作为陈献章门下几大弟子之一，在当时是颇引人注目的人物。从学陈献章后，李承箕又与其兄李承芳（字茂卿，号东峤居士，著有《东峤先生集》十五卷）归隐讲学于黄公山，被时人并称

为“嘉鱼二李”。

—

李承箕说：“吾心之理与气，相为流通，无一息之间，惟君子能体之。其言若不出口，行若